

永懷哲人

悼念謝幼偉教授

林子勛

中國文化學院華岡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謝幼偉先生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五日病逝台北三軍

總醫院，學術界失一泰斗，文化界失一門士，教育界失一導師，至堪痛悼。余忝列先生之門牆，

曾於國立浙江大學，親炙先生所授之哲學概論、邏輯與倫理三項重要課程，因得略窺哲學的門徑。今先生往矣，而典型猶在，茲就所知先生者，略舉數端，以見其幽光於潛德。

浙江大學任教時期

幼偉先生東吳大學畢業後，赴美入哈佛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返國後，斐然有聲，隨後應聘為浙江大學教授。浙大乃我國著名大學之一，雖當抗戰之際，幾經播遷，由杭州而建德，而吉安、泰和，而廣西宜山，以至貴州的遵義、湄潭。惟仍弦歌不輟，圖書儀器等設備，猶燦然可觀。當時名師薈集，如梅光迪、鄭曉滄、張曉峯、錢賓四、張蔭麟、郭斌龢、黃羽儀、鄺衡叔、陳劍脩、方杰人、沙學浚諸先生，皆一時之碩彥，幼偉先生亦其中之一。先生於中西哲學，覃研精思，擷其菁英，發其奧蘊，課堂講授，提要鉤玄，而聲若洪鐘，語驚四座。先生在遵義時，賃屋而居，室雖陋而書滿櫥，所藏尤以西洋哲學名著為多。余嘗於課餘之暇，拜謁於其寓廬，質疑問難，而



在哈佛大學唸書時的謝幼偉教授。



謝幼偉教授（後排右）與錢穆（右二）吳俊升（右三）等參加香港新亞書院員生郊遊野餐留影



謝幼偉教授與浙江大學文學院長梅光迪夫人合影。

先生誨人不倦，多方啓導，講明治學的方法，辨析中西的流別，闡述義理的本源。迄今懷思，歷歷在目，而未嘗一日或忘。先生之所以爲浙大名教授，其治學謹嚴與講授多方，實有以致之。

經世文章別具風格

「思想與時代」月刊，乃我國抗戰期間極具影響力的刊物。於三十年八月創刊，由幾位大學教授聯合主辦，而以張曉峯（其陶）先生總其事。編輯部設於貴州遵義的國立浙江大學。而付印則在貴陽。該刊定期集稿，按時出版，連續四十期，未嘗間斷。迄至黔南之役，日軍壓境，貴陽物價飛漲，該刊維持不易，因而一度中輟。接着抗戰勝利，復員又需時日，以致遲至三十六年一月始行復刊，續出第四十一期，而風格仍如往昔。創刊號徵稿啓事曾載其

發刊主旨如下：

「本刊內容包涵哲學、科學、政治、文學、教育、史地等項，而特重時代思潮與民族復興之關係，大致分爲下列六類：

- 一、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
- 二、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討。

三、西洋學術思想源流變遷之探討。

四、與青年修養有關各種問題之討論。

五、歷史上偉大人物傳記之新撰述。

六、我國與歐美最近重要著作之介紹與批評。

。」

該刊首期的徵稿啓事，揭櫫其旨趣與內容，而其所涵蓋者如此的宏博與深遠，因而每期文稿，均請各大學著名教授執筆，集國內的精英，導思潮於正軌，其所負的時代使命，不難想見。幼偉先生時任教浙大，以其深邃的哲學新知，乘其如炬如椽的妙筆，吸取西哲思想，發揚儒學精神，撰爲專文，逐期於該刊發表。總計前四十期中，除第一、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五、第十九、第三十七、第三十九等期外，每期均刊專論一篇，合計達三十二篇之多。其論西洋哲學者：如「柏烈得來的倫理觀」，「魯一士的倫理觀」，「杜威的邏輯」，「泰哥爾的哲學」，「克羅齊的倫理觀」，「懷

黑德論教育」、「柏烈得來的宗教觀」、「笛卡兒學說要旨」、「培根之方法論」、「英哲亞里山大」、「休謨之外界學說」、「萊布尼茲之玄學要旨」等篇，均為精心闡述之佳構。其論中國

哲學者：如「孝與中國文化」、「論民族生存權」等篇，亦多具獨到的見解。抗戰復員之後，該刊在杭復刊，先生仍繼續為其撰稿。計其發表者，如「論自由與道德」、「論人類與文化」、「社會學與知識論」、「實用論述評」、以及「東西文化之綜合」等篇，均曾傳誦一時，為學術界所推重。大陸淪陷之後，政府遷臺，張曉

峯先生為續該刊之餘緒，曾另辦「新思潮」月刊，以介紹西洋名著為主旨。隨後新思潮於一百期又復改名為「思想與時代」，而囑余為主編。余亦曾屢請先生為文發表，以資增重，先生雖百忙，亦必應允，而賜稿如初。於此可知先生於該刊愛護之殷，貢獻之大了。至於先生之為文，由於學養的深厚，思想的縝密，落筆敏捷，箕踞而書，從不謄稿，而字跡端正，別具風格，尤足見其工夫。

新聞界的一枝健筆

幼偉先生早年曾任廣州民國日報及華南日報主筆，為新聞界的老鬥士。大陸淪陷之後，本其忠貞的志節，南渡印尼，出任天聲日報特約撰述與自由報總編輯。以愛國的言論，振大漢之天聲；秉正義的精神，張自由之旗幟。喚醒華僑們，

辨偽別奸，不為利誘，不為威屈，厥功至偉。民國四十二年，應召返國，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領袖羣倫，主持筆政，而立言精闢，貢獻亦多。先生以哲學家的卓越識解，不僅閉戶著書，升堂講學，而更能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發揮「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儒學精神。為國家而奮鬥，為民族而效忠，成為新聞界一堅強的鬥士，令人敬佩。

哲學、教育、實踐

幼偉先生不獨為卓越的哲學家，新聞界的堅強鬥士，而尤為一位篤實踐履的教育家。吾人皆知哲學與教育有其密切的關連，哲學重理論，而教育重實踐。舉凡中西的大哲學家莫不為教育效力。如孔子的「有教無類」，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分別創辦「阿得得米」（Academy）與來心（Lyceum）學園，東西輝映，同開教化的先河。繼之而起者，何可勝數。幼偉先生一生熱愛教育，曾任椰嘉達八華中學校校長，來臺後亦出任華僑中學校長，以教導華僑青年子弟為己任。其於哲學教育方面，尤多致力。曾先後擔任國立浙江大學、中國文化學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等校的哲學系及哲學研究所主任，為哲學界培育人才。余猶憶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之初，首設哲學系，張創辦人曉峯先生，特邀幼偉先生出任該系主任，先生欣然應允，籌辦不遺餘力。後因以香港新亞書院錢院長賓四之聘，遠離臺島。而文化學院哲學系主任一職，亦不獲辭，且由其介聘專任教授代理。此固因先生與張創辦人的深厚友誼，而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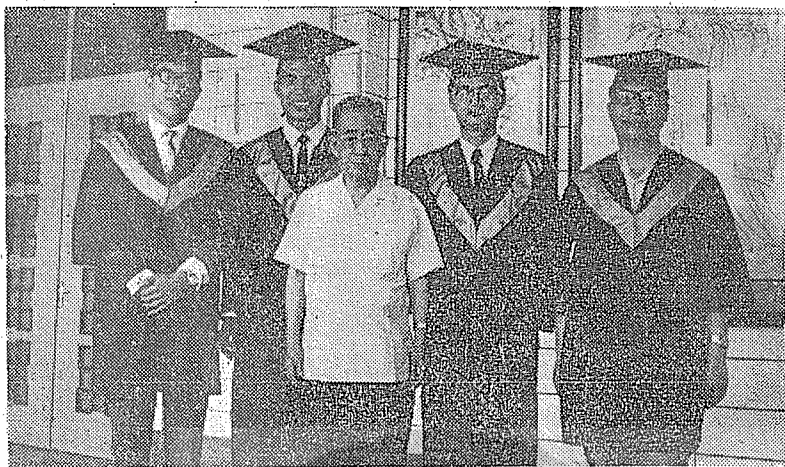
謝幼偉教授與美國參議員鄭友良合影。



其志切哲學教育的熱心所致。方今臺港兩地，哲學界人才輩出，先生主持哲學教育之功，實不可沒。

「忠之哲學」的遙譯

美國哲學家魯一士 (Josiah Royce, 1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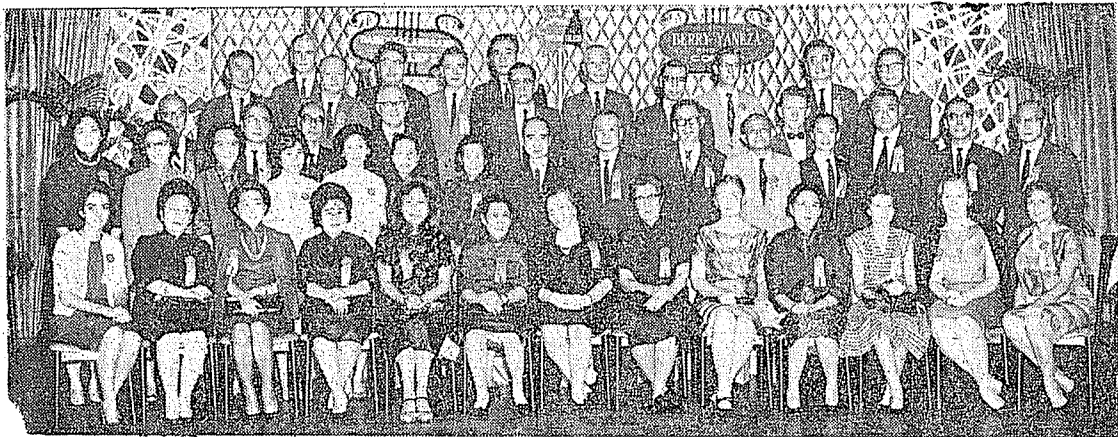
謝幼偉教授 (中) 與中國文化學院博士班同學合影。

1916) 氏，曾撰「忠之哲學」 (Philosophy of Loyalty) 一書，一八〇八年於紐約出版，為一名著。魯氏曾受德意志理想主義的影響，且為基督教思想所培育，採取了客觀的觀念論，而主絕對的主意說，又自稱為絕對的實用主義者。忠之哲學一書，為其思想之代表作。該書的主旨，以忠於忠的原理為基本的道德律 (The Principle of Loyalty to Loyalty as the Basic Moral Law) 自認其說超越於康德 (I. Kant) 的無上令式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與彌爾 (J. S. Mill) 的功用原理 (Principle of utility)。所謂忠者乃對於某一原因 (Cause) 或目的 (Goal) 的自由選擇與實際發展，而成為最高的道德標準。魯氏亦認善之發現，應遵循「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 與「意志自律」 (Autonomy of will) 的原則，如此則唯有忠於忠的本身，才能由自我以解決倫理的基本問題，此乃忠的至高至善境界，非一般言忠者所能談及。幼偉先生遙譯此書，以饗讀者，其於融會中西哲學思潮，具有深義。

「懷黑德哲學」的撰著

英國哲學家懷黑德教授 (A. N. Whitehead, 1861-1947) 為舉世馳名的哲學學者。曾任教劍橋大學十餘年，後任倫敦大學教授兼理學院院長。一九二四年離英赴美，任哈佛大學哲學教授，自由講學，蜚聲兩劍橋。而於一九三八年退休，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去世，享年八十六歲。懷氏以數學家轉而為哲學家，從高深的數學理論

，溝通其哲學思維，而有超越的創獲。懷氏曾與羅素合著「數學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 一書，為學術界所重視；其後尚有幾部有關數學的著作。而其第一部哲學名著，則為「科學與近代世界」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該書於一九二五年出版，將科學、哲學及生活的現代關係，作最有意義的申述。接着於一九二九年發表「理性之職能」 (The Function of Reason) 及「教育目的論文集」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等二書，後者為討論教育的名著，深具卓見。此外另一重要著作則為「歷程與實在」 (Process and Reality) 是書玄理深蘊，至為艱深，而為哲學界所推重。一九三三年又發表「觀念之冒險」 (Adventures of Ideas) 一書，指陳觀念在人類歷史領域中的不斷冒險。一九三八年懷氏退休之後，又發表「思想之方式」 (The Modes of Thought) 一書。一九四七年刊印其「科學與哲學論文集」 (Essays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包括他晚年所寫的論文二十篇。懷氏沉思冥索，極具智慧，其所倡事素 (Events) 之說，形成其新宇宙觀與新時空觀，深具創見。此外對於科學、宗教以及教育等方面，發為專著，亦多獨特的見解。幼偉先生肄業哈佛時，曾親炙懷氏的教澤，認為其為現代哲人中最偉大的一位，可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諸哲並駕齊驅。幼偉先生一生研究懷氏哲學，彙其所著，撰成「懷黑德的哲學」一書，闡述懷氏的宇宙觀、科學觀、宗教觀、價值觀以及論思想、論教育等七方面的精義，並附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杜威學香港會會員歡識杜威夫人留影第三排左起第五人

為謝幼偉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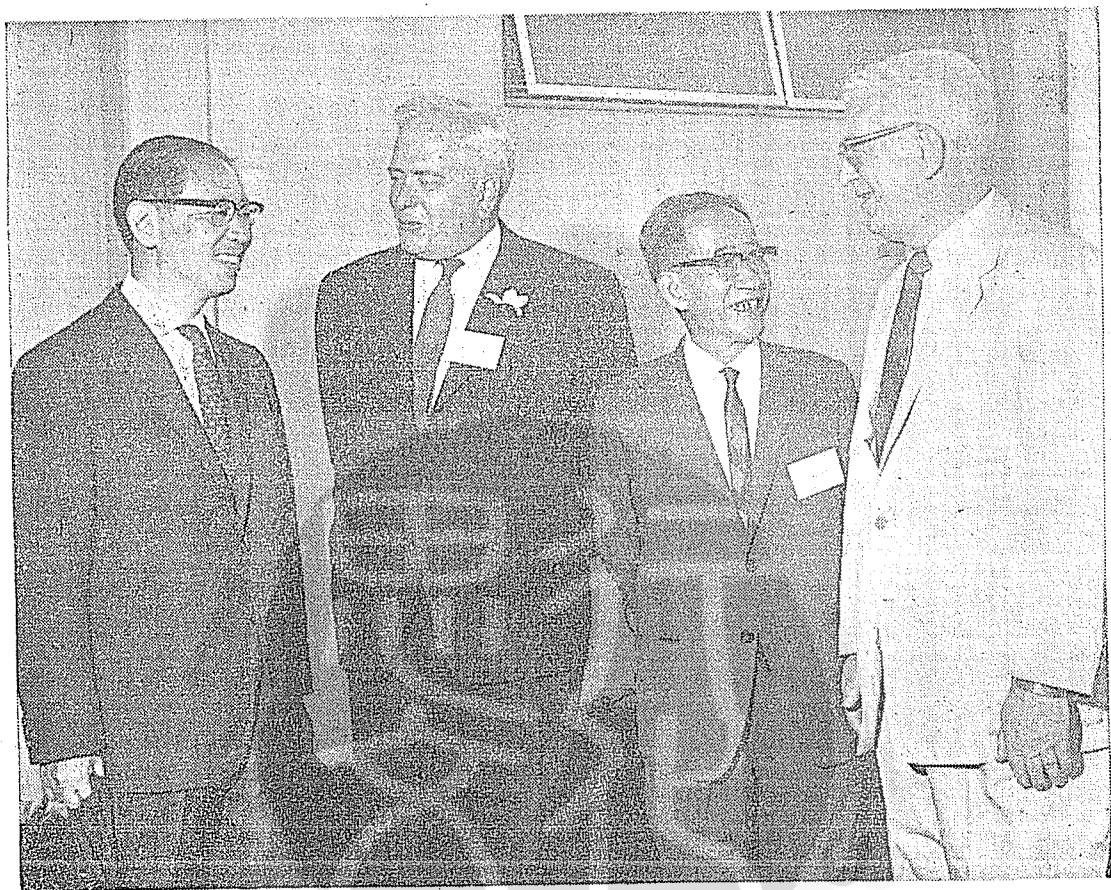
懷氏原著「理性的職能」譯文，以窺懷氏哲學思想的全貌，是書於民國六十三年十月，由臺北先知出版社印行，為研究懷氏哲學者的重要參考。

對羅素哲學的批判

英哲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為當代西方哲學的泰斗。他是一位由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數學系畢業的數學家，後來轉為數理邏輯家，又由邏輯家轉而為哲學家。他曾寫過「物質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atter, 1927)相對論入門(The ABC Relativity, 1925)。可說是一位物理學家；又曾寫過「心理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 1921)一書，也可以說是一位心理學家。此外他又寫過有關政治、社會、教育、歷史等類的專書，其研究所涉及的範圍，至為廣博。羅氏於一九二一年曾訪問我國，當時他才滿五十歲。他對於我國人的生活方式，極為欣賞。他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曾說：「許多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如能為全世界的人所採取，將可使他們蒙受幸福」(原書一二頁)。羅素又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以孔子的倫理代宗教，他說：「孔子自其社會影響言，應和宗教的教主一樣看待。他對於人類制度及思想的影響，範圍之廣乃與釋迦、基督、或謨罕默德無異，惟其性質則迥不相同。……孔子乃歷史上的人物……其所垂訓者，是一種嚴格的倫理規則，永為後人所崇拜，却極少與宗教教條相關連，因而使後代崇拜他而能治理國家的中國士大夫，獲致其完全的神學的懷疑主義。」羅氏雖崇敬孔子，但對於儒家

所倡的孝道，則有評論。他說：「孝道和一般的家庭力量，或為孔子倫理中最弱之點，也是孔子倫理嚴重地和常識脫節的僅有之點，因為家庭感情是和公共精神衝突的。而老年人的權威，則會增加古代風俗的專橫。」羅氏對於「孝」的錯誤看法，乃由於他對孔子學說和我國文化未能澈底認識，所形成的一知半解的最大謬誤。此外羅氏對於我國的考試制度，則頗讚揚。他認為我國的入股取士之法，縱有弱點，惟在十四世紀的時候，似難有更佳的途徑。這一制度促成中國人對學問的廣泛尊敬；也促成不需要世襲的貴族而有做事的可能；其所選的官吏，最低限度具有勤勞的能力；且在野蠻人征服之下，保存了中國的文化。以上羅氏對中國文化及孔子學說的批評(原書三四—四四頁)或對或錯，均於當時有相當的影響。羅氏以英國的大哲，於一九五〇年他七十九歲的時候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頒獎的評語中，稱讚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與自由思想的勇猛鬥士。」這是他聲譽最高的時候。羅氏活了九十八歲，直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日才溘然去世。在他去世不久，幼偉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追悼他，題曰：「羅素的思想與為人」，於是年三月十六日出版的「文藝復興」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發表。文中曾追述他和羅素有一面之緣。他說：「一九三〇年春，作者在美國哈佛大學肄業的時候，羅素曾到哈佛大學作過一次公開的演講，由懷黑德教授任主席。他講的是什麼？現在記不起來了。只記得懷黑德在致介紹辭時，曾表明他和羅素兩人，合寫『數學原理』，對於符號的運用，彼此是同意的



1964年夏謝幼偉教授（右二）在美國夏威夷出席第四屆東西哲人會議時與英美日哲人合影。（左為 Richard Mekeon，右為 J. N. Findlay.）

，但對於符號的意義，則彼此意見相左。同時羅素也曾表明他讀不懂懷氏的一部新著『歷程與實在』。講完後作者曾趨前和他見面，並把一本書請他簽名，可是這一本有他簽名的書，現在遺失了。」謝先生又談到他早年對哲學發生興趣，也是因為讀了羅素的一本書而引起。他說：「遠在一九二三年，我在蘇州東吳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即對哲學有興趣，而首先讀的一本英文哲學原著，就是羅素著的『哲學問題』（The Problem of Philosophy）這一本書，是羅素早年寫的（約一九一），後來他的思想，雖有很多改變，但作者認為這仍是理解羅素哲學的一本必讀的書，同時也是羅素著作中，最受歡迎，讀者最多的一本。這本書的優點，一在文字流利，二在思想清晰，三在分析精細。差不多羅素著的書，都有這些優點。所以儘管作者不贊成羅素的思想，但對於羅素所著的書，却很喜歡讀，特別是這一本『哲學問題』。因為讀羅素的書多了，對羅素的思想學問題」。因為讀羅素的書多了，對羅素的思想學問題，也便稍有所知。所以這十年來，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開『西洋現代專家哲學』一課時，曾把羅素的哲學，對學生講過好幾次；同時也寫了幾篇介紹羅素哲學的文章，在『新亞學術年刊』上發表。（包括（1）「羅素的偏見兼論西方哲學」，（2）「羅素的知識論述評」，（3）「羅素的倫理觀述評」），現均收入作者『中西哲學論文集』一書中，於去年出版。」這以上是謝先生自己說他與羅素的一段淵源。

謝先生對於羅素的哲學，曾有深刻的批評。他認為羅素的思想「始終在變化、在衝突、在搖

擺不定」，直至一九五九年他的一本「我的哲學發展」(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一書出版之後，才可算作他的晚年定論。羅素哲學最重要的部份，乃是他的知識論。他認為哲學是在追求真確的知識，但真知是從偏見(Prejudice)開始的，因此哲學是偏見而非知識。同時羅素在知識構成上，只承認感性(Sensibility)而不承認悟性(Understanding)和理性(Reason)，他在「我的哲學發展」和「人類知識的範圍及其限度」(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兩本重要的專著上，都未曾提到悟性和理性。

此外，羅素的方法論，過於着重分析，而不提綜合。分析固然重要，但綜合却是萬不可少的。這些都是羅素不健全的大偏見。至於羅素的倫理觀，更未能真實的了解人性，而昧於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羅素是從物以論人的，他視人為一束的欲望，情感或情緒，而與禽獸沒有多大的區別，所以他竟主張人與獸心的連續。」這種昧於人禽之別說法，乃是羅素哲學的最大謬誤。他的批評中國儒家所講的「孝」道，也是由於此一錯誤的觀點而來。雖則羅素也曾提到「愛」的重要，認為「良善生活，乃是愛所感動，及為知識所指導的生活」。可是對於「愛」應如何培養與發展，却始終未置一言。此種不講存養省察的工夫，

乃是西方倫理學者的通病，非獨羅氏一人為然。謝先生認為羅素以偏見談哲學，而始終限於偏見，而且他的言行也始終不一致。羅素排斥倫理學、排斥道德，可是他在生活上及文化觀點上，却仍重視道德。在「中國問題」一書中，他雖批評

中國的「孝」，但却讚美中國人的道德生活。他說：「中國文明的顯著優點，乃在人生目的的正當概念」，(原書二〇五頁)他一生四次結婚，在私德上或有問題，「但他一生究無大過，而其晚年，九十高齡，猶為反戰而遊行而入獄的精神，更是可佩的道德精神。」「蓋棺論定，……羅素的思想與為人，自有矛盾，不過這種矛盾似乎並不影響他的偉大或他的優點。」

以上所說的，乃是綜合謝先生所寫批判羅素哲學的幾篇文章，所得的結論。羅素是一位聰明絕頂、才氣橫溢的哲學家，他在他的回憶集(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中曾說：「引領人類成為哲學家的動機有好幾種，其中最令人敬佩的一種動機，是渴望去了解世界的慾望。」也許我們能從這句話，去探索羅素的哲學與趣與觀點。

「孝之哲學」的闡揚

「孝」為我國倫理的重心，也是我國人的美德，所謂「孝弟為仁之本」，尤為儒家道德精神的具體表現。謝先生特別重視我國的孝道，其討論孝的文章特別多。除在「思想與時代」月刊所發表者外，尚有「中西哲學論文集」中所收的「孝與中國社會」、「孝治與民主」等篇；在「中國哲學論文集」中，所收的「孝經與論語中孝道思想的比較」；此外中華學術院印行的「哲學論集」中，亦收有他的近著「孝之性質及其需要」一文，乃是他最後論「孝」的著作。他認為「講孝乃關人類的命運與前途的事件。」「父母子女

的愛，乃是最純潔最真摯的。」「蓋所謂孝，……就是志在保存培養及發展父母子女間這一點愛心的。」「我們儒家認為人類天生的這一點愛心，乃仁之根，愛之苗。……培養及發達這根苗的需要，我們便得承認，有講孝的需要。」他又進一步的說：「講兼愛或博愛，必先講孝，則其愛為有根之愛；不講孝而光講兼愛或博愛，則其愛為無根之愛。無根之愛，會有什麼結果呢？」謝先生所說的這一番話，真是霽然仁者之言。謝先生原想寫一本「孝之哲學」專著，終因天不假年，未能完成，真乃學術界的一大損失。

總上以觀，謝幼偉先生一生以研究西洋哲學為主，而其中心思想，則在融會中西，以發揚我國的儒學精神，而尤其着重「孝」的哲學，先生著作等身，其成書者，西洋哲學方面計有：「西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稿」與「現代名著述評」。中國哲學方面則有：「中國哲學論文集」。其論專家學者計有：「柏烈得來的哲學」、「懷黑德的哲學」等。其論倫理問題者則有「倫理學大綱」一書。其涉譯西洋專著者則有：魯一士原著的「忠之哲學」、科南特(J. B. Conant)原著的「現代科學與現代人」。其融會中西哲學思想者，則歸結於「中西哲學論文集」。幼偉先生一生以研究哲學為職志，除哲學外無嗜好。其為人嚴正不阿，寡於言而敏於行，急於義而樂於教。韓文公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先生兼而有之。真不愧為學術界的泰斗，文化界的鬥士，教育界的導師，哲學界的巨擘。(十二月五日)